

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化*

张文宏 张莉

提要：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是：对于市场化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益的非市场力量，还是市场力量的另外一种形式？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均属不易被操作化的变量，因此围绕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各有不同。本文对 2009 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大型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的不同测量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判定影响很大，但是三种不同的测量仍然产生了一个一致性结果，即市场化进程在提升了社会资本的“认可度”的同时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含金量”。

关键词：社会资本 市场化 劳动力市场

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究竟是强化还是减弱了？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由于该问题极富理论和政策意义，其研究和解决又十分不易，一时之间成为了学术前沿的难题。本文试图在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为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贡献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数据。

一、社会资本与中国市场化关系的理论实质

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梳理，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和市场化关系的核心争论是：对于市场化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正逐渐消弱的市场外力，还是持续绵延的市场内力？支持前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初期的辅助和矫正作用正随着市场制度的成熟而逐渐消弱；支持后者的研究则表明，社会资本的作用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消弱，它只是在市场化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一）社会资本的作用正随着市场正式制度的逐步确立而减弱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减弱”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的证实。我们发现，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之间的这种似乎确实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把社会资本看作一个可以呈现市场不完善特征的工具，认为在市场条件下社会资本在积累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正好凸显了市场制度建设的“盲点”。比如，关注民营企业发展的学者认为，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发展其个人的社会网络，从而保持和促进企业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完成、正式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少（杨洁、黄寰，2005）。张爽等在中国农村贫困的研究中发现，总体上来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在下降；社会资本的减弱作用主要出现在家庭层面，而在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并没有显著地减弱。因此她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其作用会随市场化的完善而减弱（张爽等，2007）。陆铭等则研究了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家庭的消费平滑提供保险的作用。他们基于 2002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本文是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11& ZD 03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两位匿名专家所提出的中肯意见。

(CHIPS)的农村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互助、公民参与及信任这三种社会资本并没能帮助中国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对于消费的冲击,并且这个发现并不依赖于同村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的同质性程度。他们的进一步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上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减弱。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当社会资本作为中国农村中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被削弱时,其作用应被正式的保险或信贷及时填补(陆铭等,2010)。

(二)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变化

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市场中的力量,它作为市场化的内在力量在市场化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首先,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有新旧之分。颜焯认为,社会资本如同物质(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总体上属中性概念,当不同主体在不同层面动用它时会显现出其积极性和消极性。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社会资本的生成条件和机制有其特殊性一面:政治上“体制洞”的存在,市场因子的渗透,“单位制”、“身份制”的相对弱化和伴之而来的“社区制”、“契约制”的进一步发育,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化”态势,以及民族内部传统信任和互惠机制等等都催生了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的繁荣和兴盛(颜焯,2004)。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等结构性安排和制度性安排影响了农民工社会资源的获得与社会网络的重新建构,而再建构社会网将明显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收益(曹子玮,2003)。

其次,市场制度建设目标从法律到信仰的提升表明了社会资本提供资源的更新。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市场机制必须的调节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遵循“市场经济意味着法制社会”准则的中国并不缺少法律法规。然而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经济与社会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要么根本不知道,要么是不想知道,甚至是知道也不怎么自觉遵守。缺乏法治和“过度规制”都是窒息经济活力和妨碍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张克中,2010:111-112)。正如张克中所言,离开了契约规则乃至内化成为道德规范的法律只会成为枷锁,让人应接不暇。社会资本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减低了交易成本。市场经济不能离开社会资本的制约。因此,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注重培育政府社会资本和投资公民社会资本,构建信任社会(张克中,2005)。

学者们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两种认知,反映了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两种理解。李林艳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为我们理解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按照她的观点,(1)认为社会资本是市场外力的学者是把承载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看成了分布于社会空间中某一区域的关系性存在。制度结构与网络结构在概念指涉上具有明确的分界,而网络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同义,一般都被解释为与正式结构相补充或匹配的一种社会安排。其中,制度安排、市场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组织策略,甚至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都被解释为关系网络存在与否及其形式差别的根源。(2)与此相对,认为社会资本是市场化发展的题中之意的学者,乃是对市场能够脱离关系网络而自主发挥作用的一种质疑。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嵌入性观念,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关系结构的普遍性及其在解释和说明社会行动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而且还蕴涵着对关系网络影响和突破制度框限的潜力的一种肯定。这一取向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倪志伟和英格拉姆明确提出,应把社会网络看成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执行机制来研究,这样一来,社会网络就成为制度产生和运作不可或缺的环节(李林艳,2004)。

李林艳的梳理为我们指出了格兰诺维特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其求职研究表明关系网络的存在和运作似乎与市场制度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其“嵌入性”观念又强调市场乃是凭借关系网络来发挥作用。而这种矛盾也成为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争论的根源: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市场经济正式制度建立前的必要过渡的学者坦言,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从非正式走向正式的趋势来看,社会资本的作用将逐渐减弱;认为社会资本是市场经济题中之意的学者推断,

从市场经济对法制建立的需求到对信任的呼吁，再到道德甚至信仰的反思，体现的是市场需求的有价值资源在不断升级，而这些有价值的资源都蕴含在社会资本中，所以社会资本的作用将持续存在。然而，这一切尚略显抽象的理论推段是否能够在劳动力市场领域中得到证据确凿的检验呢？

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经验发现

由于劳动力市场对“市场化”的反应十分敏锐，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市场化系列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一直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常用的方法。有趣的是，对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是从劳动力市场中发端的。当人力资本被发现是劳动者回报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时候，学者们对一切与人发生关系的资源的兴趣大增——人们发现，除了自身拥有的资源以外，人能够从认识的人那里获取的资源也是可增加价值的资本。因此，在劳动力市场领域中探讨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是合宜的。

赵延东和风笑天的研究赞同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在收入分配和职业地位获得的许多领域里确定了它的地位，并开始稳定地发挥着自已的作用。当市场制度逐渐确立后，作为一种非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有限。因此，尽管一个下岗职工可以运用社会资本为自己谋取一个职业，但他却无法用这些社会资本来保证自己获得较高的职业声望和收入。他们发现，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实际上只是起着一种提供机会的桥梁作用，真正决定其再就业水平的还是人力资本及其个人特征，而这正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这个结果也许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正逐渐接近于“市场经济社会”（赵延东、风笑天 2000）。

然而有学者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梁雪姬的研究发现，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表现为通过国家分配得到工作的比例在 1980 年以前、1980—1992 年、1992 年以后依次下降，以及市场分配和社会资本分配权力的增加，即社会资本分配权力的增加大于市场分配的增加。社会资本分配权力的增加有可能是通常所说的市场规范发育不完善的表现，但“网络结构观”却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市场本身就嵌入在社会关系里。市场中的竞争要素不仅包括单纯的个体性人力资本，也包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资源的一种普遍手段（梁雪姬，2001）。夏磊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仍然重视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不过所使用的网络经历了从先赋性的亲友网络向自致的社会网络的转变。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的农民工来说，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仅仅是人力资本对求职越来越重要，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新建的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本身并不是互斥的关系，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两者都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夏磊，2009）。欧美学者们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结构性因素（谭琳、李军峰，2002）。Knight 和 Yueh 于 2002 年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将在市场机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制度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的观念已经在不完全信息与存在正的交易成本的劳动力市场中得到了体现（Knight & Yueh，2004/2002）。

学者们承认市场和社会资本是劳动力市场中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的关系是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通过称“市场”为制度，而称“社会资本”为非制度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是不可分的，市场嵌入在社会资本中，因为社会资本是人类获取资源的普遍方式。这两种研究思路产生了对社会资本变量的两种操作化方式。

（一）社会资本的动用和回报：社会资本作用的减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增强

观察使用社会资本来求职、升迁以获得高回报的比例，是衡量社会资本这种资源配置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作用的最直接有效的工具。辅以时间、地区或者部门间的比较，人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

在这种思路下，学者们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发现。边燕杰提出了“网络作用空间”的概念，指出再分配与市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网络的作用始终活跃其间，但其程度是变化的。最传统的再分配经济中网络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而比较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香港是有一定限度的，从再分配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出现了“体制洞”，^①因此增加了网络活动空间。与该假设相印证的是天津、上海、厦门、广州、香港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型（边燕杰，2007：59）。

如果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意味着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转换，那么当向市场的转换逐渐完成时，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小呢？一些后续的研究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赵剑治、陆铭，2008；陆铭、李爽，2008）。Knight 和 Yueh 也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城市中年轻群体相比于年老群体更大程度地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同时，私有部门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与党员身份这两种非市场力量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重要（Knight & Yueh，2004/2002）。李爽等人也考察了市场化对社会关系网络与党员身份在中国城市不同所有制部门对个人收入的作用和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在传统的国有部门并未体现，但在非国有部门中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我们相信非国有部门市场化程度更高，那么，社会关系网络对收入的正向作用被市场力量加强了（李爽等，2008；陆铭、李爽，2008）。

按照这种方法得出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面临两重选择：（1）边燕杰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城市，在市场关联度不同的职业上是相同的，与社会资本随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假设相悖（边燕杰，2004）。当研究者发现上述这类反映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不相关的证据时，要么选择放弃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之间有紧密关系的想法，转而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独立恒定的，如文化一样，不会受到市场化的影响；要么坚持认为社会资本随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不同，因此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及其操作化测量。（2）当研究者发现数据显示社会资本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并未减弱时，要么选择认为这表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要么选择认为这表明社会资本就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即社会资本“嵌入”在不同的时期，为改变环境提供所需的资源。以下的两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继续挖掘，是对第一种方法的补充。

（二）在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提供的资源不同

边燕杰、张文宏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就业渠道存在于再分配时代、转型时代和市场时代，这说明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会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减弱。社会资本在再分配经济时代、双轨制时代和转型经济时代都提供了信息和人情两类资源。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信息资源的比例逐渐减弱，而人情资源的比例不断上升，并且人情和信息资源不断分离（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后来的研究也再次证明社会资本提供的“人情”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依然对收入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远胜过“信息”资源（边燕杰，2007：74）。这是将市场化的不同阶段与社会资本提供的资源直接联系起来的一个成功尝试。然而，豪斯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假设。她认为关系在城市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已江河日下，因为改革催生了很多新的求职途径，企业聘用标准趋于重才，跨单位、跨地域的工作流动增加，

^① 由于计划分配体制的迅速取消和新兴市场机制的缓慢发展，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体制洞。所谓体制洞，是指再分配和市场两种制度共存于转型时期，因二者不兼容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缝隙，使得为雇主和求职者传递信息、建立信任、约束责任的正式渠道运作不通畅，而关系网作为非正式渠道，发挥着填补制度漏洞的作用（Bian，2002）。

求职者的工作专业性和技能市场性都在提高。她特别指明了她所界定的“关系”就是中国式的，仅仅传递求职信息的人际联系算不上关系，真正的关系必须兼有工具性效用和责任、互惠等情感因素（Hanser, 2002）。

（三）既考察社会资本的动用空间，也考察社会资本提供的资源

还有一批学者的做法不是单纯地着重于分离社会资本提供的资源，而是首先分离劳动力市场。如果社会资本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而提供不同的资源，那么在市场化最直接的表现场所“劳动力市场”内必然会捕捉到这种变化。这种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分离来间接分离社会资本提供资源的做法，比在时间和城市范围内讨论社会资本的动用更细致，也比不讨论资源仅讨论动用更准确。黄先碧根据访谈资料提出网络关系运作的边界：工作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工作的市场竞争程度、工作岗位的技术要求（管理行业）（黄先碧，2008）。郑继国等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了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进而考察社会网络的运作空间。他们发现社会网络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关系”假说成立，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的“强关系”假说成立。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强关系”的人情却降低了工人和职位的匹配程度。这说明经济转型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郑继国等，2005）。张顺和郭小弦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低端和高端后发现，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入职收入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人情资源的影响仍然是大于信息的影响，但是使用信息关系与人情关系的作用则大于单独使用人情关系的作用，这与“信息和人情逐渐分离”的发现有些矛盾。他们也认为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受到结构约束，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制度的不确定性与竞争压力共同制约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转型期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不确定性较强，社会网络作用空间大，收入效应明显；低端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导致社会网络资源也有较强的收入效应（张顺、郭小弦，2011）。

通过对社会资本两种思路的探讨，我们倾向于赞同：有关市场化的理解，“嵌入”理论比转型理论更为贴合实际。波兰尼的“嵌入”理论（Polanyi, 1944）^①认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制度中的，格兰诺维特指出市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Granovetter, 1985），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认为经济制度生成社会（Nee, 1989）。在实际研究中，市场转型论发现了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既没有变成波兰尼的理想市场经济，也没有变成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李小佳，2004）。虽然倪志伟提出的模型偏离了实际，但是他将宏观现象纳入到微观实践中的方法和精神是值得赞赏的，相信加入了社会资本变量之后的研究会为“市场转型论”的完善带来新的启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假设

1.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9 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 2009），包括长春、天津、上海、厦门、广州、西安、济南和兰州，每个城市的样本量在 700-1000 之间。每市的抽样分区、街、居委（社区），按照统一的抽样框完成。为了保证多层次分析所要求的样本量，每个抽中的社区随机调查 20 户。在抽选的户中，按家庭成员生日与 7 月

^①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论述了这一逻辑关系：在传统的社会中，经济体系嵌入于总的社会关系中，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发挥作用，经济资源的分配还同时受到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关系的制约。而自发调节的市场一旦形成之后，市场开始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市场的逻辑通行于整个社会，指导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运行，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里，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市场将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去改造世界的运行规则，改变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社会结构的重构也将会进一步推动着制度的变迁（Polanyi, 1944；杨宇、沈坤荣，2010）。

1日的最近距离,随机抽取一位18岁以上、曾有职业经历的为被调查者,总样本为7102人^①(边燕杰、王文彬,2012)。关于调查样本社会人口特征的描述统计结果参见边燕杰、王文彬(2012)和边燕杰等(2012)。

2. 假设

如前所述,对社会资本的动用和回报在市场化进程中变化的考察是后两种方法的前提。因此我们将采用JSnet2009的数据按照第一种方法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重新进行检验。我们提出的两组竞争性假设如下:

假设1: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动员频率越高。

假设₁₀: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动员频率越低。

假设2: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动员回报越高。

假设₂₀: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动员回报越低。

如果数据分析结果支持假设1和假设2,表明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的深化越来越强,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这个结果倾向于“社会资本是市场内部力量”的论断;如果数据分析结果支持假设₁₀和假设₂₀,表明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的深化越来越弱,这个结果倾向于“社会资本是市场外部力量”的论断。

(二) 模型和变量

1. 模型

下面按照分析的步骤列出具体的统计方法和模型。

(1) 交互分析。本文采用交互分析来判断市场化对社会资本动员的影响。将动员社会资本的人数分别与部门、城市、时间做交互分析,比较动员社会资本的频率在每一市场化阶段的高低。

(2) 多元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来分析市场化与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回归方程的核心部分如下:

L 入职月均总收入对数= $\alpha + \beta_1$ (女性)+ β_2 (教育年限)+ β_3 (工龄)+ β_4 (工龄的平方)+ β_5 (党员)+ β_6 (社会资本动员)+ β_7 (单位规模)+ β_8 (管理职位)+ β_9 (职业类别)+ ε

入职月均总收入对数是因变量。 α 为常数项, ε 为误差项,其他变量依次为性别(女性)、人力资本变量(教育年限、工龄、工龄的平方)、政治资本变量(党员)、社会资本变量、结构变量(单位规模、管理职位、职业分类)。在实际分析市场化与社会资本效应的关系时,我们的做法是将入职月均总收入分别按照市场化指标调整后做回归,以期考察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随市场化程度加深的变化趋势。一般说来,“市场化”可以通过时间、城市或地区、部门、个人特征因素来反映。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社会资本这种个人特征因素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将考察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否随时间、部门、城市的不同而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以期捕捉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

2. 变量

JSnet2009在询问被访者的工作特征以及寻找这份工作时的相关情况的时候,让被访者回答寻找第一份工作的情况,或者根据当前的这份工作/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情况来回答。由于这两类人群回答的题目完全一样,只有时间的差别。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按相同的题目将两类人群合并成一类来考虑。以下的各个变量均出自合并后的新数据。

(1) 因变量

月均总收入是模型中的因变量,通过对劳动者的入职月均总收入取对数之后得到。“月均总收入”是指工资单上的总收入,加上未在工资单上反映的奖金、补贴和其他收入。

^① 2009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由边燕杰教授发起和组织,得到了李友梅和蔡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分别负责各自城市的调查工作(边燕杰等,2012)

(2) 自变量

性别变量:

女性: 虚拟变量, 1=女, 0=男。

人力资本类变量:

教育年限: 定距变量, 受访者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年限。具体操作如下: 小学以下=4; 小学=6; 初中=9; 高中=12; 职高=12; 中技=12; 中专=12; 大专=15; 大学本科=16; 研究生及以上=20; 其他=缺失值。

工龄: 定距变量, 被访者参加工作的年限。考虑到工龄和年龄相关, 在收入方程中呈曲线趋势, 我们构造了工龄的平方考察工作年资与收入的关系。在实际操作时我们用工龄的平方除以 100, 以方便对回归系数的理解(王天夫等, 2008)。

政治资本类变量:

党员: 虚拟变量, 1=是, 0=否。党员属于政治资本, 有别于社会资本。党员与收入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研究中的特色,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党员”变量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弱: 李爽等人通过比较 1995 年与 2002 年的数据, 发现党员的回报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上升(李爽等, 2008; 陆铭、李爽, 2008), 因此我们也放入此变量以与其他研究结果作对照。

社会资本类变量:

社会资本的作用指劳动者实际动用社会资本发生效果而非因劳动者拥有社会资本的范围和质量而可能产生的潜在效果。因此我们通过考察社会资本实际动员的资源对收入的作用来呈现社会资本的作用。

社会资本动员: 虚拟变量。1=有人主动向自己提供求职方面的信息或其他形式的资源帮助, 或者经自己寻找后获得了相关的资源帮助。根据前面的文献, 社会资本动员的方式包括隐性和显性两种, 因此该变量由下列两个变量合并而成。一个是隐性社会资本动员(虚拟变量: 1=有人主动向自己提供求职方面的信息或其他形式的资源帮助; 0=没有人主动提供这方面的资源帮助)。根据文献可知, 隐性社会资本动员是经常被忽略的社会资本运用方式, 它藏身在日常的非目的性交往中, “默默”实现资源的动员。这种资源的获得往往是非目的性的, 被访者一般会大方地承认。如果找工作过程比较困难, 对这样的主动帮助, 被访者出于感激印象会比较深刻。另一个是显性社会资本动员(虚拟变量: 1=回答出获得目前这份工作得到了哪些资源帮助; 0=没有回答出实际获得的资源)。问卷设计了两类问题来反映这个变量, 一类是直接询问被访者找了多少人来帮助, 一类是让被访者记录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帮助。让被访者估计找了多少人来帮助可能存在回答偏差, 被访者出于防卫心理或者觉得计算麻烦(如无法确定朋友又找了多少个朋友帮助), 会低报或者不报真实数据。考虑到对社会资本实际效用的测量存在困难,^①我们认为那些实际填答了社会资本为他们提供的具体资源的回答是可靠的, 他们代表了认同社会资本并且享受到社会资本实际效用的人群。对这两个题目的统计结果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有 2650 人回答了自己在找工作过程中找了人帮忙, 但有 3115 人回答了这些帮助自己的人具体为自己做了什么, 可以看到被访者更容易讲自己获得了什么资源, 而不是找了多少人帮忙。

结构类变量:

单位规模: 定距变量, 被访者所处的单位规模大小。这个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证实对收入性别不平等具有解释力(李春玲、李实, 2008)。

职业类别: 定类变量, JSnet2009 对职业类别的特殊选项设计让职业归类一目了然, 按

^① 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效果不易测量, 单从“使用”或者“没有使用”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因为社会资本的实际效用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行动者处于对动用社会资本的行为缺乏信心或者觉得很不够而不使用; 行动者认同社会资本但是没有找对人; 关系人认为帮助成本过高而不愿意帮助; 关系人愿意帮助但是能力不够; 雇主对关系人不信任或者觉得帮助成本过高也不愿意答应等等。这些原因既有来自行动者、关系人和雇主的偏见, 也有来自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结构约束(等级、制度、文化习俗)会对行动必须花费的成本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评估。

照它的分类我们将职业分成6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业人员和产业工人。“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由机关单位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负责人三类合并而成。由于农林牧副渔业人数太少，我们也将它与产业工人合并成为一类，这并没有影响其处在阶层底层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我们构造出6个职业类别的虚拟变量，以“农林牧副渔业和产业工人”为参照项。

管理职位：虚拟变量，JSnet2009对职业类别的选项设计中包含了对职位管理权的考察。经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将职位的管理级别处理为一个两分变量是最能体现差异性的，即管理与无管理两类。职位的管理权包括：拥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有级别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有级别的办事人员，担任经营管理的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人员，以及任工段长/班组长的产业工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构造了1个管理的虚拟变量，以“无管理”为参照项。

市场化变量：

对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的关系，以及市场化与社会资本效应的关系的考察，都依赖于对“市场化”的操作化。目前对于市场化的测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不同时间比较。这种方法直接用时间作为市场化的代理变量，观察收入性别不平等在不同时间点的走势，并将这种变化直接翻译成市场化的作用。这种方法涵盖的信息集中，结论比较稳健，因而最为常用，特别适用于“市场化”这种内涵尚不清晰的概念。但是它要求有年份紧凑的问卷资料做支持，并且由于缺乏更细节的数据支持，当变量随时间变化不断起伏让人无法琢磨其规律时，只能以“非线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类的概括归纳来处理。（2）不同部门比较。这种方法通过不同部门的比较判断市场化的作用，既能呈现市场化不同步发展的特征，也能初步控制职业分割的效应，但却可能忽略国有部门自身分化的影响和改革推进的地区不平衡性（张展新，2004）。（3）不同地区比较。这种方法与部门比较的假设相似，即市场化进程在同一时点上不同步的。通过直接测量不同地区或城市在同一时点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反映的是横截面上市场化的作用。但是这要求有代表性的市场化指标，同时需要样本量较大的调查数据来支持。采用地区来表示市场化不同程度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略显粗糙，即直接将地区或城市当作控制变量，按照对城市市场化水平的大概估计来比较相应城市的有关系数；第二种则取当地经济增长率为市场化指标，代表人物豪斯和谢宇，尽管对市场化指标做过研究的研究者发现市场化水平与当地的GDP高度相关（Hauser & Xie, 2005），但是此方法仍然被诟病，存在将经济指标误等同于内涵大得多的市场化的嫌疑；第三是以当地其他经济人口占全部职业人口的比例为市场化指标，一些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边燕杰、张展新，2002；郝大海、李路路，2006）。城市比较比部门比较涵盖了更丰富的因素，一方面，避免了部门比较对市场化内涵的简单化，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内涵过于丰富而无法呈现出规律来。（4）个人特征因素比较。以个人特征的变化来预测市场化是最冒险的方法。这种方法来源于对个人微观变化可以引起整体宏观变化的假设，起源于经济学家对教育和收入关系的著名模型——Mincer方程。由于市场化与收入及社会分层的关系，“市场转型论”的创始人倪志伟大胆地将个人特征与市场化联系在一起，首先提出市场化意味着人力资本回报增高，而政治资本回报降低的假设，引发了若干“市场转型论的悖论”。有学者发现，在不同部门和城市中，市场转型论两个假设的结果是不一致的。比如，市场部门对教育较高的回报率并不应该认为是由市场化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在市场部门的归类过程导致的（吴晓刚、谢宇，2008/2003）；市场化即地区经济增长率并不带来教育回报的增高（Hauser & Xie, 2005）；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教育回报，而市场化本身对教育无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这些结论概括起来为：第一，在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回报没有明显上升；第二，东欧（不包括俄罗斯）的市场转型确实带来了逐步提升的人力资本回报，但在这些国家，事实上人力资本的回报在“改革”之前就是颇高的（张欢华，2007）。这使得研究者开始怀疑将某

一个人特征的经济回报归于特定的分层制度机制是有问题的，在宏观的、抽象的国家和市场制度下还有很多具体的制度可能决定着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因此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注重分析具体制度的作用，并因此理解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这种方法引起的质疑和争论虽然是最多的，但也表明学者们对于通过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解释和评价宏观制度的兴趣是浓厚的。这一种容易激发灵感和思想火花的方法——因为看不清的真相就隐藏在日常行为之中。这种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即能为问题提供新鲜而尖锐的视角；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即提出的观点也许是虚假的。因此这种方法必须依靠前面的方法来修正结论的盲目和大胆，需要通过时间、部门和地区的检验。

市场化时间排序：参考相关学者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分类（如李晓西，2009），我们根据被访者开始工作的时间划分出市场化的不同时段——1978年以前的再分配时期；1978-1991年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的变化是1984年以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制度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双轨制），但从总体上看尚属计划仍占主导的时期；1992-2001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实质性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发生变革最多的时期；2002-2009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体制向全球性扩展，并且在2008年受到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感受到金融海啸第一浪的影响是在2008年11月底（李晓西，2009：345），距离本调查完成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估计从数据中很难看到金融海啸的影响。于是本文在具体操作时将没有将2008年以后的时期分别出来。

市场化部门排序：以部门代表市场化程度实际上体现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方式，通过对职业的不同分类来完成。这一直是社会学实证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变量，最常用的划分是考察所有制。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特别是非国有开放部门）的差距十分明显，一些敏锐的研究者将所有制与垄断性结合起来（边燕杰、张展新，2002；郝大海、李路路，2006）。我们参考了边燕杰与张展新的垄断行业归类以及郝大海与李路路对所有制和垄断性的整合，构造出市场化程度逐渐由低到高的部门变量：国有垄断、国有开放、非国有部门。部门变量形成的基础是我们构造出的两个虚拟变量：单位所有制（1=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0=非国有单位，包括集体企业、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行业垄断性（1=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煤气、水生产及供应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行业；0=开放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水力管理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饮食业。我们认为国有垄断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最低，非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最高。

市场化城市排序：按照2007年全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得分排列的结果，本数据来源的8个城市所在省市的市场化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1.71）、广东（11.04）、天津（9.76）、福建（9.45）、山东（8.81）、吉林（6.93）、陕西（5.36）、甘肃（5.31）（樊纲等，2010）。在此基础上我们将8个城市分成低度市场化城市（兰州、西安、长春、济南）、中度市场化城市（厦门、天津）、高度市场化城市（广州、上海）三类。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一）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

表1显示的是市场化的时间、部门、城市指标单独与社会资本动员的交互。（1）从时间上看，1978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求职的频率为17.8%，1978-1991年为

37.5%，1992-2001 年为 55.1%，2002-2009 年为 69.7%；（2）从部门上看，通过社会资本动员而进入国有垄断部门就职的被访者的比例为 43.9%，进入国有开放部门的比例为 40.5%，进入非国有部门的比例为 60.2%；（3）从城市上看，处在低度市场化城市的被访者求职时动用社会资本的频率为 48.3%，中度市场化城市中的比例为 50.2%，高度市场化城市中的比例为 47.9%。时间和部门排序的结果均表明市场化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动员，支持假设 1。城市排序的结果表明市场化似乎减少了社会资本动员，支持假设 1₀，然而其间的差别并不明显。

表 1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的交互分析 %(N)

市场化程度排序	(within 市场化程度)	
	频率	频次
1978 年以前	17.8	(230)
1978-1991	37.5	(636)
1992-2001	55.1	(641)
2002-2009	69.7	(1847)
总计(6799)	49.3	(3354)
卡方检验	Pr =.000	
国有垄断	43.9	(871)
国有开放	40.5	(937)
非国有部门	60.2	(1523)
总计(6825)	48.8	(3331)
卡方检验	Pr=.000	
低度市场化城市	48.3	(1647)
中度市场化城市	50.2	(855)
高度市场化城市	47.9	(952)
总计(7102)	48.7	(3454)
卡方检验	Pr=.006	

考虑到不应该忽视时间效应在部门和城市中的作用，我们接着考察了不同部门和不同城市中社会资本动员的时间效应（见表 2 和表 3），以期更准确地反映部门和城市中社会资本动员的差异。

表 2 部门-时间与社会资本动员的交互分析 %(N)

市场化程度排序		(within 市场化程度)	
		频率	频次
国有垄断	1978 年以前	13.8	(61)
	1978-1991	36.3	(210)
	1992-2001	58.4	(205)
	2002-2009	67.7	(380)
	总计(1932)	44.3	(856)
	卡方检验	Pr =.000	
国有开放	1978 年以前	17.7	(113)
	1978-1991	36.7	(273)
	1992-2001	55.4	(204)

	2002-2009	67.2	(336)
	总计(2250)	41.2	(926)
	卡方检验	Pr =.000	
非国有部门	1978 年以前	27.0	(51)
	1978-1991	41.0	(141)
	1992-2001	52.2	(221)
	2002-2009	70.9	(1081)
	总计(2481)	60.2	(1494)
	卡方检验	Pr =.000	

表 3 城市-时间与社会资本动员的交互分析 % (N)

市场化程度排序		(within 市场化程度)	
		频率	频次
低度市场化城市	1978 年以前	21.4	(139)
	1978-1991	39.0	(338)
	1992-2001	52.0	(307)
	2002-2009	68.9	(839)
	总计(3324)	48.8	(1623)
	卡方检验	Pr =.000	
中度市场化城市	1978 年以前	18.9	(53)
	1978-1991	39.9	(173)
	1992-2001	62.2	(163)
	2002-2009	70.6	(430)
	总计(1585)	51.7	(819)
	卡方检验	Pr =.000	
高度市场化城市	1978 年以前	10.6	(38)
	1978-1991	32.0	(126)
	1992-2001	54.8	(171)
	2002-2009	70.0	(578)
	总计(1890)	48.3	(913)
	卡方检验	Pr =.000	

表 2 与表 3 的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时间效应之后,社会资本动员频率分别与部门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与表 1 中的结果相一致的。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动用社会资本进入非国有部门的被访者几乎在各个时间阶段的比例与其他部门相比都是最高的,特别是 1978 年以前。而表 3 中的结果显示,高度市场化城市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的比例和其他两类城市相比,在各个时期都比较低,2001 年以后有回升,但是幅度不大。

(二)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的回报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频率的关系是否也体现在社会资本动员回报中呢?我们对此的考察是通过建立以社会资本动员等收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根据市场化变量调整过的月均总收入为因变量的多个多元回归方程完成的。对此本文共建立了 11 个模型(见表 4)。

模型 1 是未放入市场化变量的收入回归模型,解释力为 33.4%,最大方差膨胀系数(VIF)

为 2.107, 多重共线性较小; 动员社会资本的收入与不动员社会资本的收入相差 1.25 倍($e^{0.810}-1$) 动员社会资本远高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回报。

模型 2-5 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调整的收入回归模型。首先, 从模型 2 到模型 5 均未加入工龄变量, 因为我们发现工龄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比较严重(其方差膨胀系数(VIF)依次为: 5.603、408.398、55.949、22.635)。为了保证方程的回归系数的可靠性, 又观察到工龄变量与时间收入之间的关联程度较低(其回归系数依次为: 0.000、-0.010、0.000、-0.002), 我们采用了剔除该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模型结果显示, 不含工龄的方程 VIF 值显著缩小(依次为: 1.486、1.494、1.764、1.822), 且模型解释力并未有明显变化(含工龄的 R^2 : 0.070、0.125、0.159、0.277; 不含工龄的 R^2 : 0.071、0.123、0.160、0.277)。

其次我们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资本动员的回报越来越低。特别当我们以改革开放伊始为起点来观察时, 社会资本“贬值”的效应非常明显: 1978-1991 年动员社会资本为被访者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 13%($e^{0.119}-1$), 到了 1992-2001 年收益增加值下降为 0.4%($e^{0.004}-1$), 而到 2002-2009 年进一步下降为 -8%($e^{-0.078}-1$)。这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社会资本动员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在部门分类中也能被观察到呢? 模型 6-8 是按照部门类别变量所做的收入回归模型。虽然含有工龄变量并未对这个系列的模型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 VIF 值依次为: 2.317、2.466、4.201), 但为了保证和时间、城市类别模型的一致, 以及观察到工龄变量与部门收入之间的相关程度为零(其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为 0.000)和模型解释力的稳健(含工龄的 R^2 : 0.576、0.610、0.618; 不含工龄的 R^2 : 0.576、0.609、0.619), 我们也剔除了工龄变量。此外, 考虑到部门内部存在的时间效应, 在这组模型中, 我们放入了时间变量。模型最终的结果表明, 从国有垄断部门到非国有部门, 社会资本动员的效果也呈现“贬值”的情况: 动用社会资本进入国有垄断部门的被访者其收入比不动用社会资本者可增加 6.4%($e^{0.062}-1$), 动用社会资本进入国有开放部门的被访者其收入比不动用社会资本者可增加 12.7%($e^{0.120}-1$), 而动用社会资本进入非国有部门的被访者其收入比不动用社会资本者却降低了 10.1%($e^{0.096}-1$)。这也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进入非国有部门的比例最高”的现象相对。

模型 9-11 是按照城市类别所做的收入回归模型。与时间收入模型的原因一样, 工龄变量对城市收入模型造成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非常严重(其 VIF 值依次为: 4.543、428.348、194.861)。在剔除了工龄变量之后(工龄与城市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0.006、-0.012、0.000), 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解决。同样, 这组模型也控制了时间效应。我们看到, 社会资本动员回报的“贬值”现象并未出现在城市收入模型中: 低度市场化城市中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会使得自己的收入减少 3.8%($e^{0.037}-1$), 中度市场化城市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会使自己的收入增加 9.5%($e^{0.091}-1$), 而高度市场化城市的被访者动用社会资本会使自己的收入增加 13.4%($e^{0.126}-1$)。

表 4 个人月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1978 年前)	模型 3 (1978-1991)	模型 4 (1992-2001)	模型 5 (2002-2009)
女性 ^a	-.382***	-.103	-.110	-.420***	-.209***
教育年限	.198***	.056***	.040*	.076***	.085***
工龄	.000!				
工龄的平方	-.000009**				
党员 ^b	-.560***	.008	-.137	-.126	-.058
社会资本动员 ^c	.810***	.064	.119	.004	-.078**
单位规模	-.00002***	-.000001	-.000001	-.00002***	.000002
管理职位 ^d	.523***	.335*	.732***	.463***	.479***
职业类别 ^e					
专业技术人员	.597***	.348**	.759***	.478***	.163**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755***	.568***	.967***	.208!	.325***
办事人员	.698***	.097	.811***	.193	.010
商业人员	1.286***	.276	.655***	.422***	.125**
服务业人员	1.142***	.193	.588***	.457***	.041
时间 ^f					
1978-1991					
1992-2001					
2002-2009					
常数项	2.893***	3.126***	3.981***	5.893***	6.328***
Adj R ²	.334	.071	.123	.160	.277
N	7102	1289	1694	1164	2652

Max VIF	2.107	1.486	1.494	1.764	1.822
---------	-------	-------	-------	-------	-------

续表 4

	模型 6 (国有垄断)	模型 7 (国有开放)	模型 8 (非国有)	模型 9 (低度市场化城市)	模型 10 (中度市场化城市)	模型 11 (高度市场化城市)
女性 ^a	-.139*	-.161**	-.288***	-.219***	-.183**	-.191**
教育年限	.101***	.061***	.060***	.047***	.076***	.092***
工龄						
工龄的平方						
党员 ^b	.014	-.078	-.187**	-.124*	-.091	.023
社会资本动员 ^c	.062	.120*	-.096*	-.037	.091	.126!
单位规模	.000009!	-.000007**	.000004	-.000004	.000001	-.000004
管理职位 ^d	.427***	.470***	.531***	.432***	.515***	.546***
职业类别 ^e						
专业技术人员	.050	.688***	.587***	.381***	.506***	.351***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401***	.662***	.457***	.559***	.726***	.331**
办事人员	-.051	.457***	.424***	.206**	.298*	.178!
商业人员	.223	.369**	.378***	.403***	.513***	.211*
服务业人员	.101	.410***	.310***	.329***	.410***	.070
时间 ^f						
1978-1991	.958***	.707***	.928***	.759***	.625***	1.428***
1992-2001	2.544***	2.558***	2.711***	2.504***	2.473***	3.245***
2002-2009	3.139***	3.043***	3.055***	3.144***	2.895***	3.400***
常数项	2.770***	3.093***	3.445***	3.248***	3.226***	2.855***

Adj R ²	.576	.609	.619	.664	.600	.668
N	1981	2313	2531	3411	1704	1987
Max VIF	2.289	1.958	4.071	2.564	2.750	2.675

注：(1)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2) ! p<0.1, * p<0.05, ** p<0.01, *** p<0.001。(3) a 参照项为“男性”；b 参照项为“非党员”；c 参照项为“未动员社会资本”；d 参照项为“非管理职位”；e 参照项为“农林牧副渔及和产业工人”；f 参照项为“1978年以前”。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社会资本动员回报的确受市场化进程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含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交互作用的模型，如表 5 所示。

表 5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交互作用的个人月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女性 ^a	-.201***	-.199***
教育年限	.068***	.068***
工龄		
工龄的平方		
党员 ^b	-.054	-.053
社会资本动员 ^c	.153	---
单位规模	-.000002	-.000002
管理职位 ^d	.481***	.481***
职业类别 ^e		
专业技术人员	.405***	.404***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543***	.543***
办事人员	.232***	.230***
商业人员	.336***	.336***
服务业人员	.261***	.259***
时间 ^f		
1978-1991	.863***	.843***
1992-2001	2.690***	2.670***
2002-2009	3.168***	3.149***
部门 ^g		
国有开放	-.074	-.097*
非国有	.250***	.232***
城市 ^h		
中度市场化	.344***	.330***
高度市场化	.456***	.441***

时间*社会资本动用ⁱ

1978-1991	-0.054	.056
1992-2001	-.187!	-.077
2002-2009	-.227*	-.119!
部门*社会资本动用 ^j		
国有开放	.041	.093
非国有	-.198**	-.159*
城市*社会资本动用 ^k		
中度市场化	.092	.118!
高度市场化	.227**	.253***
常数项	2.872***	2.915***
Adj R ²	.656	.656
N	7102	7102
Max VIF	11.522	5.043

注：(1)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a 参照项为“男性”；b 参照项为“非党员”；c 参照项为“未动员社会资本”；d 参照项为“非管理职位”；e 参照项为“农林牧副渔及和产业工人”；f 参照项为“1978 年以前”；g 参照项为“国有垄断”；h 参照项为“低度市场化城市”；i 参照项为“1978 年以前动用社会资本”；j 参照项为“国有垄断部门动用社会资本”；k 参照项为“低度市场化城市动用社会资本”。

为与表 4 的模型保持一致，模型 1 和模型 2 均不含工龄变量。模型 2 比模型 1 多剔除了一个社会资本动员变量，因为社会资本动员变量的 VIF 值为 11，已经给方程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里的篇幅允许，故将该表列出来）。从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社会资本动员的回报随时间的推进而下降，随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下降，随城市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这样看来，时间排序和部门排序的结果显示市场化减小了社会资本动员回报，支持假设 2₀；城市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化显著增大了社会资本动员回报，支持假设 2。

（三）讨论

我们预先的假设认为，如果社会资本是市场的内生力量，那么它在劳动力市场领域中的作用势必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而增强，具体表现为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增加，回报增加；如果社会资本的作用代表的是市场的过渡，那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它劳动力市场领

域中的作用会减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会下降，回报也会下降。然而本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表明，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和回报关系是负向的；并且对市场化的城市测度结果与时间测度和部门测度不一致。这两点导致了无法作出社会资本随市场化作用增强还是减弱的直接判断。尽管如此，以下三点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1. 对市场化的测量影响对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判定

市场化的时间序列和部门市场化程度的结果是一致的，表明市场化增加了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显著减小了社会资本动员的回报。与之相反，城市市场化程度的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略微降低了社会资本动员的频率，但是却显著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回报。这说明，对市场化指标的认定将直接影响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判定。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指标来对“市场化”进行操作化测量，未来还需要我们进行多种测量方式的深入比较分析。

2. 市场化增加了社会资本的“认可度”却降低了其“含金量”

尽管市场化的时间、部门和城市测量结果有相异之处，但是在本数据中它们均显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即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动员与社会资本动员的回报之间的关系是负向的。模型结果显示，以时间和部门来表征市场化时，社会资本动员频率与市场化进程成正比，而社会资本动员回报与市场化进程成反比；以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来表征市场化的不同阶段时，社会资本动员频率与市场化进程成反比，而社会资本动员回报则与市场化进程成正比。我们认为这十分符合“物以稀为贵”的现象：当社会资本使用率不高的时候，其增值空间很大；而当社会资本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一种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时，社会资本的价值相对贬值。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资本概念的确具有典型的“资本”特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本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资本的“认可度”随着市场化进程提升，但其“含金量”随着市场化进程下降的现象。

我们推测，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解释党员人数增加，但是党员身份对于收入呈现负向影响的效应，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对收入回报增加有限的情况。

3. 社会资本的概念需要被整合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实证研究中充满了概念的混杂：网络、信任、制度、规范、志愿服务、自愿组织、互助、公民参与等概念都可以用来表征社会资本的不

同层面或特征。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缺乏完备的社会资本统计数据,国内少数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及相关问题时,都尝试性地采用了一些替代指标,如自愿无偿献血率、信任、社会总保费、民间组织等(杨宇、沈坤荣,2010);同时,制度、经济增长、甚至某种经济现象也都可以作为描述市场化的指标。对“社会资本”和“市场化”概念的不统一使得研究者对社会资本本身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问题给出的结论莫衷一是,也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如何受市场化影响的结果更令人扑朔迷离。即便是在对社会资本界定相对清晰的劳动力市场领域中,也存在着关系、网络、资源等相近概念的混杂。要使得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证检验的学术积累意义,需要认真讨论形成大致统一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测量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我们对社会资本动员的操作化着眼于被访者实际获得的资源而展开的。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繁多,但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的概念不外乎(网络)位置、关系、资源这三种。我们认为,“资源”才是“关系”和“位置”所以重要的原因。离开“资源”的“关系”和“位置”在行动中的作用是难以理解的;并且,由于“资源”是“资本”的原型,于是承载“资源”的“关系”和“位置”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资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因此,社会资本在“资源”概念上具备实现整合的可能(张莉,2012)。

参考文献:

-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07,《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
- 边燕杰、王文彬,2012,《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文宏,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第3期。
- 边燕杰、张展新,2002,《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曹子玮,2003,《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郝大海、李路路,2006,《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黄先碧,2008,《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社会》第6期。
- 李春玲、李实,2008,《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林艳,2004,《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爽、陆铭、佐藤宏,2008,《权势的价值: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 李小花,2004,《从嵌入的观点反思市场转型理论》,《社会科学家》第1期。
- 李晓西,2009,《中国市场化进程——李晓西的观察与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

- 梁雪姬, 2001,《市场转型、社会关系与职业获得》,《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 陆铭、李爽, 2008,《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第9期。
- 陆铭、张爽、佐藤宏, 2010,《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 谭琳、李军峰, 2002,《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基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7期。
- 王天夫、李博柏、赖扬恩, 2008,《城市收入性别差异及其演变: 1995-2003》,《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吴晓刚、谢宇, 2008/2003,《市场真的有回报吗?——对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Wu, Xiaogang & Yu Xie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夏磊, 2009,《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社会》第2期。
- 颜焯, 2004,《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杨洁、黄寰, 2005,《民营企业家的社会网络》,《社会科学家》第9期。
- 杨宇、沈坤荣, 2010,《社会资本、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第2期。
- 张欢华, 2007,《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问题与争议》,《社会》第6期。
- 张克中, 2005,《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资本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
- , 2010,《社会资本: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新视角》,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张莉, 2012,《社会资本: 展示资源分配规则的理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3期。
- 张爽、陆铭、章元, 2007,《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
- 张顺、郭小弦, 2011,《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第1期。
- 张展新, 2004,《市场化转型中的城市女性失业》,《市场与人口分析》第1期。
- 赵剑治、陆铭, 2010,《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 赵延东、风笑天, 2000,《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
- 郑继国、李猛、陈静, 2005,《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职业调整行为的影响》,《世界经济情况》第12期。
- Bian, Yanjie 2002, "Institutional Holes and Job Mobility Process: Guanxi Mechanisms in China's Emerging Labour Markets." In T. Gold, D. Guthrie & D. Wank (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Hanser, Amy 2002, "Youth Job Searches in Urban China: The Use of Social Connections in a Changing Labor Market." In T. Gold, D. Guthrie & D. Wank (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ser, Seth M. & Yu Xie 2005,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4.
- Knight, J. & L. Yueh 2002,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Discussion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中文版: J. Knight 和 L. Yueh, 2004,《社会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李实、佐藤宏主编《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作者单位: 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文宏）
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张莉）

责任编辑：杨 典